

中晚唐史学精神与史论体咏史诗

韦春喜

(鲁东大学文学院, 山东烟台市 264025)

摘要: 中晚唐文人完成了由初盛唐纯粹文辞之士到知识型、学者型学士的转换, 文史兼擅并融的主体文化特征使史学精神对史论体咏史诗产生影响成为可能。具体而言, 传统史鉴致用精神虽在初唐已很成熟, 但其真正普及却是在中晚唐。受此精神影响, 史论体咏史诗多以垂鉴致用为目的, 以君主为主要讽谏对象, 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针对性。自《春秋学派》开始形成的疑经新变、委曲发明的史学精神使士子在涉足经史内容时, 往往对传统的经史之义进行大胆怀疑, 对史实进行细致辨析, 倡扬新说, 促成了翻案体的产生。适应思想重建的要求, 中晚唐史学开启义理之途, 提倡以史治心, 转变入史观念。这使史论体咏史诗多注意阐发史实背后的道德义理, 具有儒学道德化、义理化的特点; 从心性角度思考问题; 导致了赞扬奇节义士、高隐大德诗风的盛行。

关键词: 中晚唐; 史学精神; 咏史诗; 史论体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史论体咏史诗是我国古代咏史诗中的重要类型, 是指对历史事件、人物主要采取议论的手法, 表达对历史的评论、反思的一种咏史类型。因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 它在中晚唐时期得以大量产生¹。由于重在表达历史识见、思想, 而历史识见、思想又和当时的史学精神紧密关联。就目前研究现状而言, 学界多侧重于对此时期咏史作家作品个案分析, 尚未对史论体与史学精神的关系进行综合研究。基于此, 本文试就这一问题, 略作探讨。

一、从以文为事到文史兼容——史学精神对史论体咏史诗产生影响的前提

从本质上讲, 文学与史学属于不同门类, 自南朝宋元嘉十五年(438)设玄、儒、文、史四科后, 文史殊途, 除个别人物如沈约、魏收等外, 文人多不长于史。由于史论体咏史诗的创作主体多是文人, 在这种情况下, 要探讨中晚唐史学精神对它的影响, 必须弄清楚此时期文人对历史文化的接受情况。

唐代政权自贞观以后, 贞观君臣出于以史经世目的的史学建设浪潮与以历史兴亡为政治鉴戒的精神逐渐消歇, 统治者为显示“文治之盛”, 在文化建设上更多地走向了一种以文为事的道路。这一点集中体现在盛唐前类书编撰上, 如显庆三年(658)许敬宗、上官仪、董思恭等的《瑶山玉彩》五百卷, 大足元年(701)张宗昌等的《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 玄宗时徐坚、张说等编撰的《初学记》三十卷等。与这种以文为事的国家文化建设策略相配, 太宗以后科场文化注重以文辞取士的主导倾向, 使士子们从总体上形成了崇尚文采声韵的社会风气。“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 因循遐久, 浸以成风。以至于开元、天宝之中, ……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 征文射策, 以取禄位, 此行已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 兄教其弟, 无所易业, 大者登台阁, 小者仕郡县, 资身奉家, 各得其足, 五尺童子, 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 四方观听, 希其风采, 每岁得第之人, 不浹辰而周闻天下。”^{[1]357-358}为了中举, 此时期的士子多去记忆与背诵能够提高文学水平的类书, 查看“随身卷子”^{[2]1331}, 缺乏对中国古代以经史为主导的知识的真正阅读与思考, 即所谓“进士以声韵为学, 多昧古今; 明经以帖诵为功, 罕穷旨趣”(唐玄宗《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3]146}。在

1

关于产生原因, 可参见拙作《试论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产生的历史文化原因》一文, 载《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这种情况下,缺乏史学根基的士子虽然经过渐次累积开创了中国古代诗歌引以为豪的盛唐气象,但繁华的文辞、玲珑的兴象背后却透露出史学知识与思想的平庸与匮乏。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皇权不振、藩镇割据、外族侵扰、吏治黑暗等各种矛盾暴露出来。衰败混乱的社会现实使统治者再也不能像盛唐以前的君主那样,在一种蒸蒸日上的良好政治格局中与学士文臣们“飧会游豫”,“感即赋诗”^{[4]5748},以文华相娱。他们更多地走向了历史,探究经史知识,在历史资源中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以史为鉴,反映了由以文为事到以经史为事的转变。宋洪迈《容斋三笔》卷第九《君臣事迹屏风》条云:“唐宪宗元和二年,制《君臣事迹》。上以天下无事,留意典坟,每览前代兴亡得失之事,皆三复其言。遂采《尚书》、《春秋后传》、《史记》、《汉书》、《三国志》、《晏子春秋》、《吴越春秋》、《新序》、《说苑》等书君臣行事可为龟鉴者,集成十四篇,自制其序,写于屏风,列之御坐之右,书屏风六扇于中,宣示宰臣。”^{[5]521}《旧唐书·王起传》载:“文宗好文,尤尚古学。郑覃长于经义,(王)起长于博洽,俱引翰林,讲论经史。”^{[6]4279}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云:“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直殿学士从容,未尝不论前代兴亡。”^{[7]2}这些史料都反映了中晚唐统治者注重经史知识的文化态度。

同时,在官吏选拔任用方面,是否具有历史才能,能否从历史中寻绎社会现实所需的政理,也成为统治者选拔、提升士子的主要标准之一。《旧唐书》卷十八载唐武宗之敕云:“如郎官、御史能有驳难,或据经史故事,议论精当,即擢授迁改以奖之。如言涉浮华,都无经据,不在申闻。”^{[6]604}《新唐书·郑瀚传》载:“文宗立,(郑瀚)入翰林为侍讲学士。帝使萃撷经史为《要录》,爱其博而精,试举诸条摘问之,随即酬析,无留答,因赐金紫服。累进尚书左丞。”^{[4]5061}康骈《剧谈录》卷上载:“有小案置于御床,案上有书两卷,(唐宣宗)指谓相国曰:‘朕听政之暇,未尝不披寻史籍。此读者先朝所述《金镜》。一卷则《尚书·大禹谟》。’复问:‘卿曾读《金镜》否?’对曰:‘文皇帝所著之书,有理国理身之要。披阅诵讽,不离于口。’上曰:‘卿试举其要。’相国跪于御前,抗声而诵,至‘乱未尝不任不肖,理未尝不任忠贤;任忠贤则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则受天下之惑’,……上曰:‘曩者仰卿材器,今日睹卿词学。’……居岁余,遂为宰相。”^{[8]1461}由此可见,中晚唐时期,士子能否具有历史知识,从历史中探寻理国资治之道,对他们的仕途将起到重要作用。

更重要的是,统治阶级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理性态度对盛唐以前以文为事的文化策略、以文取士的科举弊端进行反思。广德元年(763),以礼部侍郎杨綰为首,包括李栖筠、李廌、贾至等朝臣在内,认为士子只重文辞,浸以成俗,致使当时:“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6]3430}对此,朝廷接受了他们试策要“皆问古今理体及当时要务,取堪行用者”^{[6]3431}的主张。其后,赵匡上《举选议》,一方面批评科举制:“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惟无益于用,实亦妨其正习;不惟挠其淳和,实又长其佻薄。”^{[3]1593}另一方面,他对试策考试提出了可行的建议:试策范围涉及《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前朝正史以及“国朝自高祖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3]1594}等。考试的重点应放在:“于所习经史内问,经问圣人旨趣,史问成败得失,并时务,共十节,贵观理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3]1594}其后,长庆三年(823)谏议大夫殷侗上《请试史学奏》云:“历代史书,皆记当

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谕劝戒。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蔚宗两《汉书》，旨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代教”^{[3]3481}，提出要重设史科、《三传》科等。对此，朝廷予以接受，“于是立史科及《三传》科”^{[4]1166}。由上述史料可知，统治者开始以一种国家强制的方式改变初盛唐以文为事的文化策略，强化士子对历史知识的掌握，要求士子能够通过对历史成败得失的分析，挖掘其中的“旨义”，发挥“惩恶劝善”，有资“政理”的积极作用。

在科举制度、统治者自身及其用人所显示的文化导向影响下，中晚唐文人除了要记诵文采性的诗赋辞章，更要注重以经史为核心的史性文化的学习，尚学重史之风应运而生。《旧唐书·路随传》载：“（路泌）少好学，通《五经》，尤嗜《诗》、《易》、《左氏春秋》，能讽其章句，皆究深旨。博涉史传，工五言诗。”^{[6]4190}《唐代墓志汇编》“大中一四〇”条《唐故承奉郎守大理司直沈府君墓志铭》载：“（沈中黄）童蒙聪悟，幼而能文，弱冠已后，穷经造圣，如抱饥渴，昼不问膳，夕不口带，莫顾寒暑，以竞寸阴。古人有聚萤映雪缉柳编蒲者，不足以侔矣。如此积廿年，故讽六籍如贯珠，话青史如指掌，文章一百首，考试三百场，为《解言》上下各十九章，……文藻之价，摇动内外。”^{[9]2360}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云：“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10]511}

在这种情况下，与初盛唐相比，文人完成了由初盛唐纯粹以文辞取胜的文士到知识型、学者型学士的转换，文史兼擅并融成为他们突出的主体文化特征。像李翰、梁肃、权德舆、韩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杜牧、皮日休等，均长于文史，且多兼史官。这种特征使他们既可以参与到史学者阵营中，成为阵营中的主要力量或成员，也可以把中晚唐的史学精神、新风真正渗透到史论体咏史诗的创作中。

二、鉴戒致用的史学精神与史论体咏史诗

为解决社会现实中的问题，通过思考历史以寻求解决的方法和答案；或从历史人物、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以警示社会统治者；或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把握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从而为当前的政策制定提供可行性证明。这些都可以称为“历史鉴戒”。它的目的是致用于现实，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

为了能够从前代的兴废存亡中，总结出治国为政之道，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初唐统治者对历史特别重视，相继诏修成《周书》、《北齐书》、《隋书》等五代史。他们认为修史的意义在于：“经典序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高祖《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11]466}“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朕（唐太宗）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12]6657}可以说，到了初唐时期，以史为鉴致用的精神在以李世民、魏征等为代表的贞观君臣那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标举倡扬。

一种史学精神的产生、成熟固然重要，但它能否在社会中产生重大影响，还要看时人对它的接受状况。垂鉴致用的史学精神在贞观时期已非常成熟，但它的接受、应用主体主要是以李世民、魏征等为代表的政治家、史学家，接受群体的范围是有限的。并且，贞观以后以文为事的国家文化建设策略使这种精神逐渐消歇。士子沉浸于文藻辞采中，在类书背诵中获取“关于国家的知识，关于历史统系的知识，关于宇宙的知识，关于道德与秩序的知识”^{[13]17}以属辞应对，缺乏对古代史性文化的真正思考，群陷于思想的平庸中。而安史之乱

后,面对一蹶不振的政局与混乱衰微的社会现实,以科场文化为重点的文化建设策略的要求,由以文为事到文史通融的知识型、学者型的人格构建,使大批文士兼具史才,整个社会形成了探讨历史兴亡、论辩古今盛衰的社会风尚与标崇历史学识的风气²。这必然导致史鉴致用精神在中晚唐时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社会普及。如,柳宗元《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认为其史学著作《非国语》的编撰目的是:“苟不悖于圣道,而有以启明者之虑,则用是而罪余者,虽累百世,滋不憾而恶焉。”^{[3]2570}白居易《晋谥恭世子议》云:“盖善恶始终,必褒贬于一字。所以彰明往者,劝沮来者。”^{[14]2828}《与元九书》云:“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14]2792}罗隐《馋书重序》云:“盖君子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3]4143}由这些史料可见,中晚唐的历史垂鉴与经世致用精神在文人那里得到了充分体现。

虽然史论体在文学形式上是诗,但就内容而言,它与一般的山水、咏物等作有本质区别,更多地属于历史范畴,对历史的议论分析必然以当时的史学精神为指导。晚唐诗人胡曾《咏史诗序》云:“夫诗者,盖美盛德之形容,刺衰政之荒怠,非徒尚绮丽瑰琦而已。……曾不揣庸陋,转采前王得失,古今□□,□成一百五十首,为上中下三卷,便以首唱相次,不以年□□先。虽则讥讽古人,实欲裨补当代,庶几与大雅相近者也。”^{[15]1023}周昙著有《咏史诗》八卷,《全唐诗》编为两卷,其《吟叙》、《闲吟》有自序性质,说明撰写的目的:“历代兴亡亿万心,圣人观古贵知今。古今成败无多事,月殿花台幸一吟。”(《吟叙》)“考摭妍媸用破心,剪裁千古献当今。闲吟不是闲吟事,事有闲思闲要吟。”(《闲吟》)^{[16]8416}胡序与周诗说明了中晚唐时期咏史诗创作与当时的以史为鉴、致用于当世精神之间的关系。

在以人治、专制为特征的封建社会,国家的治理与衰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为政能力、道德水平等,这导致了“鉴戒史学,作为传统史学的主体,以帝王为主要劝戒对象。”^{[17]31}在这种情况下,中晚唐史论体的鉴戒对象主要集中于君主,多通过对前代兴国、特别是亡国之君的评论来探寻国家兴亡之因。如刘禹锡《金陵五题·台城》:“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18]712}通过形象的语言,认为陈代灭亡的原因是由于统治者的奢侈荒淫。又如被白居易列为讽谕诗的《读汉书》:“小人与君子,用置各有宜。奈何西汉末,忠邪并信之?不然尽信忠,早绝邪臣窥。不然尽信邪,早使忠臣知。优游两不断,盛业日已衰。痛矣萧京辈,终令陷祸机?每读元成纪,愤愤令人悲。寄言为国者,不得学天时。寄言为臣者,可以鉴于斯”^{[14]28}对西汉末的历史进行评论,认为君主忠邪混淆,易导致国家衰微,“寄言”句则反映了作者的以史垂鉴致用的精神。

为挽救国运时局,中晚唐君主对于谏言问题有明确的认识:“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容;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是则人君与谏者交相益之道也。”^{[19]7384}这种意识使统治阶级在对待现实针对性、批判性非常强烈的史鉴时,多持接受或宽容态度,对士子多不之罪。《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八载:“上(宪宗)问宰相:‘为政宽猛何先?’权德舆对曰:‘秦以惨刻而亡,汉以宽大而兴。太宗观《明堂图》,禁扶人背,是故安、史以来,屡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自亡,由祖宗仁政结于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则宽猛之先后可见矣。’上善其言。”^{[19]7683}又卷二百四十三载:“(敬宗)游幸无

² 关于此点,可参见拙作《试论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产生的历史文化原因》一文,载《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常，昵比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二月，壬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献《丹扈六箴》：……其《纳海箴》略曰：‘汉鹜流涵，举白浮钟；魏睿侈汰，陵霄作宫。忠虽不忤，善亦不从。以规为瑱，是谓塞聪。’……上优诏答之。”^{[19]7842}

统治阶级对史鉴所持有的宽容态度，既促成了史鉴之风的盛行，也使士子敢以一种强烈的批评精神进行史论，使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如李商隐《华清宫》：“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16]6197}罗隐《马嵬坡》：“佛屋前头野草春，贵妃轻骨此为尘。从来绝色知难得，不破中原未是人。”^{[16]7611}对玄宗宠杨贵妃事进行议论，意在戒鉴统治者不要好色，否则会产生严重社会灾难。历史鉴识虽然传统，但其批判精神却颇为辛辣。宋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唐诗无讳避”条云：“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李义山《华清宫》、《马嵬》、《骊山》、《龙池》诸诗亦然。今之诗人不敢尔也。”^{[5]236-237}指出了中晚唐以史论体为代表的诗歌所具有的批判精神，但他尚未认识到此时期统治者的史鉴精神及宽容态度与史论体咏史诗批判性之间的关系。

历史鉴戒致用的前提总是针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需要。现实政治有何问题，又规定着历史经世致用的选择。这导致了中晚唐士子以史鉴戒致用的现实性，决定了史论体咏史诗的针对性。范摅《云溪友议》卷下“和戎讽”条载：“宪宗皇帝朝，以北狄频侵边境，大臣奏议，古者和亲之有五利，而日无千金之费。上曰：‘比闻有一卿能为诗，而姓氏稍僻，是谁？’……侍臣对曰：‘此是戎昱诗也。……’上悦曰：‘朕又记得《咏史》一篇，此人若在，便与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称诗人之兴咏。’圣旨如此稠叠，士林之荣也。其《咏史诗》云：‘汉家青史内，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欲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上笑曰：‘魏绛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论矣。”^{[8]1301}又如刘禹锡《韩信庙》：“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汉室叹良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实际上是针对贤相裴度“屡被排挤”，“终不能重用”^{[18]717}而发。这两则资料说明了史论体咏史诗的针对性与史鉴致用的现实性之间的关系。

三、疑经辨伪、委曲发明的史学精神与史论体咏史诗

安史之乱后的政治危机、社会现实导致了思想危机，如何对传统史性文化进行重新思考，使其焕发新意，彰显有助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价值，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思考的重要问题。这一点在影响中晚唐甚至宋代史学思想的《春秋》学派那里得到集中体现。此派的代表是啖助、赵匡、陆淳等，代表著作是《春秋集传纂例》、《春秋集传辨疑》、《春秋微旨》等。他们从“以权辅用，以诚断礼”，“从宜救乱，因时黜陟”（啖助《春秋统例序》）^{[3]1584}的权变宗旨出发，倡导“裨补阙漏，商榷得失”（啖助《春秋统例自序》）^{[3]1584}，“拨乱反正”，“端本清源”（陆淳《春秋集传微旨序》）^{[3]2764}的自出心源的史学创新精神，开疑经辨伪之风。此派对中晚唐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使《春秋》学成为当时的学术探讨重心。如卢仝《春秋摘微》、刘柯《三传指要》、陈岳《春秋折衷论》、孙邰《春秋无贤臣论》、皮日休《春秋决疑》等，都是沿袭啖、赵、陆的学术思路，迭发新论。更重要的是，此学派的史学精神，因陆淳曾任太常博士、太学博士、东宫侍读，参与贞元六年（790）修撰礼典之事，使《春秋》学派由啖助时的私家传授之学开始进入官学，并获得科场文化的认可³。这必然导致《春秋》学派精神不仅仅局限于经学、

³ 关于《春秋》学派与科场文化的关系，可参看查屏球《唐学与唐诗——中晚唐诗风的一种文化考察》（商务

史学界的学术精英身上，而为社会中的一般士子所普遍崇奉。

疑经辨伪的史学精神使士子在涉足于经史内容时，往往对传统的经史之义进行大胆怀疑发难。此点在史论体咏史诗中得以体现，如柳宗元《咏三良》、刘禹锡《古调》二首其一。柳氏“恒愿扫于陆先生（陆淳）之门”，“得执弟子礼”（《答元饶州论〈春秋〉书》）^{[3]2569}，是《春秋》学派的一个代表。其《三良》诗论《左传·文公六年》三良事：“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20]546-549}由此可见，《左传》认为让三良殉葬是于国不义之举，对国家霸业不利，殉葬的罪魁祸首是秦穆公。而柳氏则把批判的重点放在了穆公之子康公身上：“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21]124}“魏氏”句用《左传·宣公十五年》典：“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20]764}作者借此典故说明无论穆公是否有殉葬之意，但决定、主办殉葬之事的无疑是康公，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可以看出，柳氏对《左传》经义的否定。与柳氏并称的刘禹锡，与陆淳同属永贞政治革新集团，理应受其影响。其《古调》云：“轩后初冠冕，前旒为蔽明。安知从复道，然后见人情”^{[18]557}。前二句语出《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统统塞耳，所以聿聪也。故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22]274}“从复道”用《史记·留侯世家》典：“上（刘邦）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23]2042}刘邦听从张良建议，封其“平生所憎”的雍齿，平息诸将疑议。在此诗中，刘氏对传统经义表示反对，提倡君主应当以至明之心体察外间人情，防止祸乱发生。明孙月峰曾评点柳宗元《三良》诗云：“后半评论多，翻觉板拙，似史断不似诗。”（《评点柳柳州集》卷四十三）^{[21]127}实际上刘诗也具有“史断”的特点。孙氏主要从诗艺角度评价，实际上没有认识到《春秋》学派的疑经精神与史论体咏史诗的关系。

要从传统的章句、疏注之义中走出来，直指文本，对传统经史内容进行诠释，以达到“不本所承，自用名学”^{[4]5708}的学术目的，离不开对经典文献的细致解读。中唐《春秋》学派对春秋时期“事或反经而志协乎道，迹虽近义而意实蕴奸，或本正而末邪，或始非而终是，介于疑似之间者，并委曲发明，故曰‘微旨’。”^{[24]334}这种“委曲发明”以寻求微旨大义的精神获得了士子的普遍认可。权德舆《送前丹阳丁少府归余杭觐省序》：“著作（按：指丁少府）由经术进，遍观东观石渠之奥。……咨取古义，发明隐伏。”^{[3]2226}王慤《唐故徐宿濠泗观察判官试大理评事兼监察侍御史李府君墓志铭》云：“自幼及长，语默不自逸，惟勤力于学问，虽寒暑早暮无倦，遂博涉经史，业诗辍文，其雄词丽藻，抉幽摘微，盛为前达所许。”^{[15]1031}陆龟蒙《甫里先生传》云：“先生性野逸，无羁检，好读古圣人书，探六籍，识大义，就中乐《春秋》，抉摘微旨。”^{[3]3732}“抉幽摘微”、“抉摘微旨”实际上与“委曲发明”是一个意思。受这种史学精神影响，史论体咏史诗往往能就历史事件细致辨析，烛幽探微。如白居易《思子台有感》二首，其注云：“凡题思子台者，皆罪江充，予观祸胎不独在此，偶以二绝辨之。”其一云：“曾家机上闻投杼，尹氏园中见掇蜂。但以恩情生隙罅，何人不

解作江充？”其二云：“暗生魑魅蠹生虫，何异馋生疑阻中？但使武皇心似烛，江充不敢作江充。”^{[14]1700}又如陆龟蒙《范蠡》：“平吴专越祸胎深，岂是功成有去心。勾践不知嫌鸟喙，归来犹自铸良金。”^{[16]7269}对于范蠡归隐之事，一般集中在其功成身退层面。而此诗则深入一层分析，认为他帮助勾践平灭吴国、掌握越国大权，对于勾践而言具有严重的政治危险，实属祸胎。因此其归隐是不得已而为之。由白、陆之诗，可见委曲发明的史学精神对史论体的影响。

与疑经辨伪、委曲发明相伴随的，则是权变创新的史学精神。启萌新史学精神的《春秋》学派主张“权”、“宜”，体现出穷则思变的史学创新主张，致使当时士子“穿凿诡辨，垢前人，舍成说，而自为纷纷”^{[4]5708}。史学主流朝着通达权变，务为新说的方向发展。这不仅在一些史学家那里，也在普通士子身上得到反映。李观《帖经日上侍郎书》云：“十首之文，去冬之所献也。有《安边书》、《汉祖斩白蛇剑赞》、《报弟书》、《邠宁庆三州飧军记》、《谒文宣王庙》、《文大夫种碑》、《项籍碑》、《请修太学书》、《吊韩弇没胡中文》等作，上不罔古，下不附今，直以意到为辞，辞讫成章。”^{[3]2398}杜牧《与池州李使君书》云：“滞于所见，不知适变，名为腐儒，亦学者之一病。”^{[3]3448}《上安州崔相公启》云：“至于会昌三年八月中所献相公长启，铺陈功业，称校短长，措于《史记》、《两汉》之间，读于文士才人之口，与二子并无愧容。”^{[3]3456}皮日休《文薮序》云：“两汉庸儒贱我《左氏》，作《春秋决疑》。其余碑、铭、赞、颂、论、议、书、序，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较其道，可在古人之后矣。”^{[3]3702}

这种权变倡新的精神，使以杜牧、皮日休为代表的士子在史论体创作时，自然能摆脱成说，善于从影响历史发展的各种条件、因素出发，对历史进行客观审视，推翻前案，“在作史者不到处别生眼目”^{[25]24}，产生了史论体中的翻案体。如杜牧《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16]6028}对于项羽，一般多赞叹其英雄气概，或同情其兵败自杀，或总结其失败教训。持论都是从既定的历史结局出发。而杜牧则认为项羽如能忍辱负重，重邀才俊之士，东山再起不是没有可能的。可谓“死中求活，非浅识所能道”（谢枋得《唐诗绝句补注》）^{[26]741}。这实际上强调了主观能动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又如皮日休《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16]7150}一般史论认为，隋炀帝为奢侈浮靡的享受与娱乐，修建汴河，引发了隋朝灭亡。而诗人在批判隋炀帝主观动机的同时，充分肯定开凿此河具有积极的社会作用。这样新警的观点是和其卓越的史见分不开的。其《汴河铭》云：“夫垂后以德者，当时逸而后时美；垂后以功者，当时劳而后时利。……故天下事不逸不足守，不劳不可去。致其利害，生于贤愚之主，自古然耶？则隋之疏淇汴，凿太行，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3]3707}可见，皮诗的观点实际上是这一新说的表达，反映了史论体咏史诗与倡扬新变的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

四、崇尚义理、以史治心的史学精神与史论体咏史诗

中晚唐藩镇割据，吏道浸微，皇权不振，民风败坏的社会现实，其实质在于对传统封建文化、思想权威与秩序的破坏。如何“对国家的权威和秩序从根本上加以重建”^{[13]118}，成为此时期思考的重大问题。要端正人的现实行为，就要端正人心，毕竟人心即人的精神、思想对其现实行为起着决定作用。因此，如何革除弊端，重拾人心，重建人的道德精神世界自

然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话题。

在这种时代话题的召唤下,弘扬儒家教化,以明王道,成为士子从事文化重建的核心。代宗时名臣贾至、杨綰在总结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时说:“近代趋仕,靡然向风,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向使礼让之道弘,仁义之道著,则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节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摇也。”^{[6]3433}在这种情况下,弘扬儒家教义,进行道德教化,势在必行。“居家者必修德业,从政者皆知廉耻,浮竞自止,敦庞自劝,教人之本,实在兹焉。”^{[6]3432}为适应这种道德重建的要求,中晚唐的史学家多摆脱初盛唐繁琐的疏章句之学,本着儒家道德伦理理念,惩恶劝善,弘扬王道。启导新史学之路的《春秋》学派提倡“因史制经,以明王道”,通过对春秋历史的解析以发挥“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不失纤芥”的救世作用^{[27]383}。史学家兼古文运动的先驱柳冕在《答孟判官论文生评史官书》提出:“六经之作,圣人所以明天道,正人伦,助治乱。”“圣人之于春秋,所以教人善恶也。”并认为史学家司马迁的修史之过在于:“不本于儒教,以一王法。”“法者,凡例褒贬是也,而迁舍之。《春秋》尚古而迁变古,由不本于经也。”^{[3]2371}韩愈以“道”自任,把裁正善恶是非而传之无穷作为志向:“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答崔立之书》)^{[10]168}由这些史料可见,中晚唐史学主要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彰善瘅恶,维护封建正统所认可的政治与伦理道德秩序,即所谓“王道”的意识。否则就会遭致士子的批判。中唐史官柳芳著《唐历》,因“不立褒贬义例,为诸儒讥讪”^{[4]4536},就是一例。

受这种史学思潮影响,中晚唐士子在涉足历史人物、事件时,多注意阐发史实背后的道德义理,在善恶忠奸的辨析中,昭示王道,教化示人,致使史论体在思想上具有儒学道德化、义理化的特点。如杜牧《题桃花夫人庙》云:“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度几春?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16]6027}认为作为国君的夫人,最起码要有忠心。特别是国家因其容貌而亡,息夫人更应以死事之。而与西晋绿珠以死殉情相比,她忍辱偷生,以一身而事二夫,根本不值得同情与认可。可谓笔有斧钺,“足以订千古是非”^{[28]461},从而赢得了“二十八字史论”^{[29]385}之誉。又如周昙《咏史诗》卷下《子密》诗云:“子密封侯岂所宜,能高德义必无为。当时若缚还彭氏,率土何忧不自归。”其自注云:“臣之弑君,子之弑父,奴害其主,天壤之内,有能容者哉?况宠夫妻皆为所害,验其凶逆之状,无所可容。是时,赤眉已降,宠非光武之敌,况其已死。如能恶其不义,缚二奴并二首驰还彭氏之子,燕中之人得不感其义而归之?则岂独燕人,而率土之人,莫不向其风、归其义也。”^{[30]172}可见,这两首都表现出以儒家忠义作为评判标准以察别善恶,褒贬深严,无异于春秋笔法。

由于史学思想是思想领域的一部分,是时代思想在历史领域的一种反映。在中唐儒学复兴运动中,以韩愈、李翱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把古代儒家思想引向了心性之学,讲求社会主体内在性的道德、心性修养,由内在心性的圆满而渐求外在社会秩序的和谐。受此社会思潮影响,中唐以后的史学越来越注重人性、人心对历史的影响。这一点早在《春秋》学派那里已初露端倪。啖助、赵匡、陆淳等提出“正以忠道,原情为本”^{[27]379}实质上是要求伦理纲常、秩序的确立要建立在人的性情的基础上。其后,柳冕《答孟判官论文生评史官书》认为“求圣入之道,在求圣入之心”^{[3]2371}。皇甫湜《东晋元魏正闰论》提出“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3]3115}的史学主张。晚唐刘蜕在史论文《禹书》中则明确提出了“心治”与“功治”概念,认为

“心治乎人也”^{[3]3662}。

这种以史治心的史学思想致使史论体往往从心性、性理角度思考问题，注重向内寻求、道德内省。如周昙《咏史诗》云：“贪泉何处是泉源，只在灵台一点间。必也心源元自有，此泉何必在江山。”其自注云：“夫人之贪廉清浊，皆自心源，源清则清，源浊则浊也。贪出于浊，廉出于清，能坚其清，浊岂能乱之。……是知乎贪浊之由，清廉之士，何关所饮，只在乎源。”^{[30]192}胡曾《咏史诗·豫让桥》云：“豫让酬恩岁已深，高名不朽到如今。年年桥上行人过，谁有当时国士心。”^{[16]7476}这两首诗都表现出从心性角度评价历史的精神。同时，以史治心的史学思想使史论体在思索以君主形象为政体象征的国家施政之道时，往往否定外在性的事功追求，而崇尚帝王的心术修养，倡导内在的德治服化与自省。如汪遵《长城》：“秦筑长城比铁牢，蕃戎不敢过临洮。虽然万里连云际，争及尧阶三尺高。”^{[16]7020}罗邺《新安城》：“若算防边久远名，新安岂更胜长城。谩兴他役悲荒垒，何似从今实取兵。圣德便应同险固，人心自不向忠贞。但将死节酬尧禹，版筑无劳寇已平。”^{[16]7564}表达了希望统治者注重修德而边患问题自然解决的观点。

中晚唐史学意识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择人入史观念的变动。在此以前，人们多以历史人物的政治、社会地位等作为入史的主要标准。而心性道德观的逐渐强化使中晚唐士子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动。李翰《三名臣论》认为：“夫才生于代，功与运成，固有才优而功微，运合而才劣，先当格以道德，合于始终，审其邪正，观其去就，然后事可明也。”“主恩非臣下之所图，天命岂生人之所制？安可以功业之成败，断才能之长短耶！”^{[3]1940}李翱《答皇甫湜书》明确提出：“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群党之所谓为是者，仆未必以为为；群党之所谓为非者，仆未必以为非。使仆书成而传，则富贵而功德不著者，未必声名于后；贫贱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煊赫于无穷。”^{[3]2839}史官路随认为：“凡功名不足以垂后，而善恶不足以为诫者，虽富贵人，第书其卒而已。……伯夷、庄周、墨翟、鲁连、王符、徐穉、郭泰皆终身匹夫，或让国立节，或养德著书，或出奇排难，或守道避祸，而传与周、召、管、晏同列。故富贵者有所屈，贫贱者有所伸。……然则志士之欲以光辉于后者，何待于爵位哉！”^{[31]1308-1309}这种把人物的心性道德作为入史条件的意识，使士子把大量“贫贱而道德全者”纳入史论视野，扩充了题材范围，促成了史论体赞扬奇节义士、高隐大德之风的盛行。这一点是前代或前期咏史诗所难见到的。如唐彦谦《严子陵》、陆龟蒙《严光钓台》、黄滔《严陵钓台》、李频《过四皓庙》、罗隐《四皓庙》、崔涂《过陶征君隐居》、吴融《首阳山》、陈陶《经徐穉墓》、李九龄《写庄子》、周昙《颜回》、《鲁仲连》、薛巽《善卷祠》、韩琮《巢父井三绝》、虚中《善卷坛》等。这些作品所咏诸人大多鄙弃外在的功名利禄，隐居闲处，以修德葆真为贵。仅以薛巽《善卷祠》为例：“子长爱奇故不收，况乃著论非许由。先生踪迹重埋没，引舜作证应点头。天下大器尚不欲，万古虚名岂愿留？江北漫空山不静，说著高风簪可投。”^{[16]11205}善卷，尧时贤人，晋皇甫谧《高士传》卷上有传。此诗首先批评了司马迁尚奇而不重道德之士的史学思想，然后转向善卷高德的赞扬，可以说典型反映了史学精神的变化对史论体择取历史人物的影响。

综上所述，中晚唐文人完成了由初盛唐纯粹文辞之士到知识型、学者型学士的转换，文史兼擅并融的主体文化特征使史学精神对史论体咏史诗产生影响成为可能。具体而言，传统史鉴致用精神虽在初唐已很成熟，但其真正普及却是在中晚唐。受此精神影响，史论体咏史

诗多以垂鉴致用为目的,以君主为主要讽谏对象,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针对性。自《春秋学派》开始形成的疑经新变、委曲发明、权变倡新的史学精神使士子在涉足于经史内容时,往往对传统的经史之义进行大胆怀疑,对史实进行细致辨析,倡扬新说,促成了翻案体的产生。适应思想重建的要求,中晚唐史学开启义理之途,提倡以史治心,转变入史观念。这使史论咏史诗多注意阐发史实背后的道德义理,具有儒学道德化、义理化的特点;从心性角度思考问题;导致了赞扬奇节义士、高隐大德诗风的盛行。

参考文献:

- [1] 杜佑. 通典[M]. 北京:中华书局, 1988.
- [2] 遍照金刚撰. 卢盛江校考. 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M]. 北京:中华书局, 2006.
- [3] 董诰, 等. 全唐文[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4]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 [5] 洪迈. 容斋随笔·容斋三笔[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6] 刘昫, 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 [7] 吴文治. 宋诗话全编: 壹[Z].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 [8]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9] 周绍良主编. 唐代墓志汇编: 下[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10] 马其昶. 韩昌黎文集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11] 宋敏求. 唐大诏令集[Z].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
- [12] 王钦若等编. 宋本册府元龟[Z]. 北京:中华书局, 1989.
- [13]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第二卷)[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 [14] 朱金城. 白居易集笺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15] 陈尚君. 全唐文补编[Z]. 北京:中华书局, 2005.
- [16]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全唐诗(增订本)[Z]. 北京:中华书局, 1999.
- [17] 谢保成主编. 中国史学史(一)[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 [18] 瞿蜕园. 刘禹锡集笺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19]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 1956.
- [20]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 1990.
- [21] 王国安. 柳宗元诗笺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 [22] 高明. 大戴礼记今注今译[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民国六十四年.
- [23]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
- [24] 纪昀等撰.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 1997.
- [25] 胡震亨. 唐音癸签[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26] 霍松林. 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 下[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 [27] 陆淳. 春秋集传纂例[M]. 文渊阁四库全书[Z]: 第 146 册.
- [28] 王应麟. 困学纪闻[M]. 文渊阁四库全书[Z]: 第 854 册.
- [29] 许顗. 彦周诗话[M]. 何文焕. 历代诗话[Z].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 [30] 赵望秦. 宋本周昙《咏史诗》研究·宋本周昙《咏史诗》校正[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31] 王溥. 唐会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The History Spirit of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ang Dynasty and the History Discussing Style of History-Intoned Poetry

Wei-Chunxi

(the Literature School of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264025)

Abstrac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writer to intellectual was finished, scholars of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ang Dynasty had the culture characteristic of having a good command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The characteristic made it was possible that history spirit can influence the History Discussing Style. Making a concrete analysis, we found that traditional spirit using history warning and affecting reality was very mature during the initial stage of Tang Dynasty, but its popularity emerged during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pirit, the History Discussing Style concentrated on warning monarch and affecting reality, therefore had strong criticism and pertinence. Since the *ChunQiu* school, the spirit which discarded the old classics ideas and brought forth new ones made scholars double traditional connotations of scripture and history, discriminate history facts carefully and advocate new ideas, therefore the *FanAn* style emerged. Adapting to the demand of building new thought system, historiography in the period opened the learning of righteousness and principle, advocated the study of heart world and changed the criterion of choosing ancient into histo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pirit, the History Discussing Style paid attention to clarify morals which hidden in history, had the nature of Confucian righteousness and principle; thought problems from the angle of heart-nature; caused the poetry atmosphere of praising the moral, loyal or hermitic figures.

Key Words: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ang Dynasty; history spirit; History-Intoned Poetry; History Discussing Style

作者简介: 韦春喜（1976—），男，山东苍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2010 年博士后，鲁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本文原载《史学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